

中國地緣政治與台灣戰略價值

洪浦釗 / 東吳大學政治研究所研究生

壹、前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簡稱中國）自1978年開始經濟改革，政治維持共產黨領導，經濟往資本主義調整的策略，使得中國的整體綜合國力逐年提升。穩健的綜合國力發展，也讓中國的影響力由過去在第三世界國家之外，開始向周邊區域輻射出去。順著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國吸取全世界的資金進行經濟發展，經濟的成長帶動軍事科技的提升，連帶國際政治地位的上揚。雖然現階段的中國尚無法在全球事務與美國平起平坐，但在東亞區域則有其發言的地位。東亞區域在後冷戰時期，可稱上是強權的，除美國之外，則非日本、東協及印度莫屬。然而，美國在後冷戰時期所欲找尋對抗的稻草人，在中國逐漸崛起的過程，這個稻草人也逐漸成型。中國威脅論的發酵，讓美國把稻草人的對象開始轉為中國，在中國東亞沿海區域的國家，莫不是美國影響力可及之國。

中國如何突破在東亞區域外部敵對力量的圍堵，是其極欲解決的課題。唯有讓世界覺得中國的崛起是對世界有益的，中國才能夠真正成長，這也是中國領導高層強調中國的「和平崛起」的理由。¹不過，現在的中國強調掌握發展的契機，力求周邊局勢的穩定，不要有影響中國發展的負

面變動因素。但在中國完成發展之後，其要如何突破東亞區域的圍堵？領土的佔領已是不可行，在周邊國家又無法真正相信中國的「和平崛起」，唯一的突破點則在台灣身上。

自1949年中國建國以來，對台灣的鬥爭即一直不間斷，從聯合國席次中國的代表權之爭，到現在的台灣主權之爭，以各種的方式逼迫台灣。過去台灣一直不為中國所重視，何以如今中國用盡心力，也要將台灣掌握在手。中國對外強力主張「台灣是中國固有領土」，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任何外部力量不可介入。姑且不論台灣的主權歸屬問題，儘管台灣主權根本不屬中國所有。但中國唯有在這樣的主張下，才能夠突破美國於第一島鏈的封鎖，往太平洋開展出去。因此，中國對台灣的主張，究竟是存在怎麼樣的價值意涵，是本文研究動機所在，台灣對於中國而言是單純的領土主權主張，或是中國擴張勢力的戰略跳板？本文試圖由地緣政治的理論途徑進行探討中國崛起的地緣安全環境，並且分析台灣在中國的地緣戰略規劃下，其所具有的價值為何？當中國追求這些價值的同時，其將遭遇怎樣的挑戰，而這些挑戰是否會危其發展的目標？

貳、中國地緣安全的形勢變化與戰略選擇

中國古代地緣政治的主要特點：1、領土遼闊但相對封閉，這主要是因為地理障礙在科學技術不發達的古代，幾乎是難以逾越的，從而使中國成為近於封閉的地理單元。2、地緣政治結構呈現以中原為中心的環狀特徵，在古代中國，中原地區一直都是政治、經濟、文化以及軍事的中心與重心。3、地緣政治和國防重點一直在北方，對中原王朝威脅最大長期以來都是北方的遊牧和狩獵民族。除明朝曾一度比較注重在東部海上防範日本侵擾外，中國古代地緣政治威脅和國防的重點一直在北方。² 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國的地緣戰略面對著海陸兩大強權的競爭，使得其必須採取不同的策略以因應局勢的轉變。以下就中國的地緣戰略變化說明：

一、冷戰初期：兩極對抗-「一邊倒」戰略

1949年10月1日中國建國，正是二次大戰結束不久，冷戰開始的年代。整個國際局勢擺脫過去由歐洲國家所主導，轉變為由美蘇兩強所各據一方的兩極對抗體系。在中國共產黨取得中國的政權前，1948年2月史達林即指出：「如果社會主義在中國取得勝利，我們兩國沿著共同的道路前進，那麼，就可以認為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是有保障的。我們就不怕任何突發性事件的威脅。因此，對於援助中國共產黨人我們不能吝嗇自己的力量。」³ 因此，新中國成立後首先所獲得承認的國家即是蘇聯。

中國建國之初即面對選擇投入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以及以美國為領導的資本主義陣營的選擇，中國選擇加入社會

主義陣營。毛澤東面對這樣的國際局勢決定中國必須採取所謂「一邊倒」的地緣戰略決策，他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指出：「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⁴

「一邊倒」政策選擇的原因，第一、意識形態的同質性使得中國與蘇聯的親近，同時蘇聯的政治及經濟模式也提供中國學習的方向。因此，毛澤東指出：「我們在國際上是屬於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一方，真正的友誼援助只能像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國主義方面去找。」⁵ 其次，美國支持國民黨政府，對於中國政府則採取漠視與消極的態度，並在國際間影響中國的國際地位。最後最重要的一點即是地緣政治的考量，由於中蘇邊境有著七千多公里的界線，一旦中國採取與蘇聯對立的態勢，那對剛建立的中國而言將會面臨最立即的壓力，而與美國的意識型態衝突也使中國無法投向美國陣營，因此「把中蘇兩國的友誼固定下來建立同盟關係……。帝國主義如果準備打我們的時候，我們就請了一個好幫手」。⁶ 這樣的政策選擇引起了美國與中國在地緣政治上的衝突。中國學者樓耀亮指出：「在美國的地緣政治視野中，與蘇聯結盟的中國，被看是蘇聯控制下的陸上力量向歐亞大陸邊緣及海洋世界發動攻勢的前沿，從而將中國視為其在太平洋沿岸的主要敵人。」⁷ 布理辛斯基（Brzezinski）也表示，「在這場衝突中，地緣政治和戰略考慮起著關鍵作用，決定著衝突的焦點和內容，並且最終決定著衝突的結局。」⁸

因此，美國開始其「圍堵政策」對中國採取不承認的政治孤立，大規模軍事的嚇

阻以及經濟上的限制。隨後的韓戰、二次的台海危機及越戰都威脅到中國的生存與安全。

二、冷戰中期：中蘇交惡與中美和解 - 「一條線」、「一大片」戰略

中國建國之初，不但獲得蘇聯的政治承認，更獲取不少蘇聯的經濟及科技援助。不過隨著雙方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日漸加大，其影響性更擴散到兩國的國家關係上。除了1959中印邊界衝突中蘇聯公開支持印度，中印雙方也於1962年爆發戰爭。蘇聯更於1960年片面召回其派遣在中國的專家及技術人員，也廢除兩國經濟技術合作的各項協議，給「中國的經濟建設造成嚴重的困難和巨大損失，導致中蘇關係惡化。」⁹ 蘇聯自1966年後多次與中國發生邊界衝突，從3月的中蘇、中蒙的邊界衝突，到1969年的3月，蘇聯與中國在珍寶島爆發大規模的武裝衝突，雙方的邊界衝突可說是到了白熱化的階段。中國外交部更發表文章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們將把來犯的敵人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¹⁰ 隨著衝突日益加深，且已有發生全面戰爭的傾向，兩國領導人也開始透過會談來降低衝突的擴大。1969年10月20日雙方於北京舉行邊界問題談判，透過協議重新開始經貿交流，雙方恢復正常關係。不過，中蘇關係的惡化，也使得這時的中國在地緣政治上，「面臨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個超級大國的全面威脅」。¹¹

隨著中、蘇之間矛盾的加大，中國感受到來自蘇聯的巨大壓力，而這時美國也因越戰的拖累，國力的損耗加劇，雙方就國家利益的考量都認為在這樣的局勢下應該做進一步的接觸。美國認為拉攏中國可以

降低來自蘇聯的壓力，因為蘇聯必須分心注意中國，這樣可使中蘇彼此制衡。另外，美國有意自越南撤軍，而中國在這點上可以提供幫助。另一方面，中國盤算著與美國站在一起的利益，首先，與美國和解至少免除了同時與兩大強權敵對的狀態；其次，可以透過美國的幫助走入國際，進而解決有關台灣主權的爭議。之後，中美開始多次的一般會談，而兩國首次正式會談的即是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Kissinger）的密訪中國，季辛吉於1971年7月9日至11日到中國進行保密不公開的訪問行程。雙方談論了有關尼克森（Nixon）總統訪華的公告文稿，內容表示：「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會晤，是爲了謀求兩國關係的正常化，並就雙方關心的議題交換意見。」¹² 隨後毛澤東在1973年2月17日與季辛吉會面時，提出他要「按緯度劃一條連接從美國到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歐洲的戰略線（一條線），並團結這條線以外的國家（一大片）。」¹³ 共同對付蘇聯。毛澤東描繪一個宏觀的世界地緣戰略架構，而「這個以世界爲背景的宏大的地緣戰略構想，對中國的生存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¹⁴

1972年2月21日尼克森應周恩來總理的邀請抵達北京，進行爲期七天的歷史之訪。尼克森總統與毛澤東主席進行會面，雙方做一個簡單的會談。隨後進行更多的是尼克森與周恩來的會談，雙方自22日開始，共進行了五次會談，焦點主要是著重在越南與台灣的問題上，另外再就一些國際局勢交換意見。中美雙方在經過多次的會談協商，終於在2月28日共同簽署「上海公報」。公報的重點有三，第一，雙方同意以和平共處五原則來處理國與國之間

的關係；第二，中美雙方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第三，關於台灣問題各自陳述自己的立場。¹⁵ 儘管這次雙方會談後的爭論不少，但平心而論，這次促成「上海公報」的簽署，「標誌著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的開始，為中美關係的發展奠定了基礎」。¹⁶ 不過隨著尼克森的下台，中美關係正常化的發展受到延遲。但是，中美雙方仍持續進行頻繁的會晤，使得中美關係大大進展。美國卡特（Carter）總統上台後表示，美國對華政策「將以上海公報為指導」，「政策目標是關係正常化」。¹⁷ 中美雙方於1978年12月16日宣佈建交，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

中美的建交在於彼此都面對著蘇聯的巨大壓力，為了能夠化解或抵銷部分壓力，雙方都秉持著「朋友的朋友是我的朋友，朋友的敵人是我的敵人，以及敵人的敵人是我的敵人。」¹⁸ 進一步而言主要是「中蘇矛盾大於中美矛盾，美蘇矛盾大於美中矛盾。」¹⁹ 三方的合縱連橫形成一個三角制約的形勢，儘管中國的實力是最弱的一方，但「他的制約與平衡的戰略作用卻非常重要。」²⁰

總而言之，中美和解促使兩國在地緣政治上都擴大其國家利益的獲取，而中國更是獲益最深。中國除可全心應付來自蘇聯的威脅，更可以聯合美國抵禦蘇聯，因此「大大改善了中國的安全環境」²¹

三、冷戰結束：蘇聯解體 - 「和平與發展」戰略

自中美建交以來，美國更加擴大對蘇聯的圍堵，特別是雷根（Reagan）總統上台，推行所謂的「雷根主義」（Reagan Doctrine），也就是「美國要承擔抵抗蘇

聯及由他支持的在世界任何地方的侵略，支持反共產主義的起義並擊退共產主義，在第三世界建設美國式的民主」。²² 不僅如此，雷根更加宣揚蘇聯的軍事優勢已大幅超越美國，美國必須增加軍事預算以應付。因此，雷根推動「星戰計劃」（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把蘇聯拉進新一輪的軍備競賽之中，從而以軍事、經濟及技術的競爭來拖垮蘇聯。蘇聯在這樣的情況下，等到戈巴契夫（Gorbachev）上台，蘇聯的經濟已是停滯不前，因此戈巴契夫開始蘇聯的政治改革。戈巴契夫推行「新思維」，強調世界已今非昔比，世界上的新問題在不能再依照過去世世代代留下來的思維方式來解決了。戈巴契夫的政治改革導致蘇聯的解體，之後組成獨立國協，俄羅斯為主要大國。同時東歐也脫離了鐵幕，進而造成冷戰的結束。

冷戰的結束也意味著兩極體系的瓦解，國際體系進入了後冷戰時期，美國順理成章成為世界的超強國家。中國與獨立國協的俄羅斯及烏克蘭在這樣的情勢下，重新建立新關係。中國同俄羅斯開始就雙方在邊界的爭議進行協商，更加強彼此在政治、經濟、軍事及科技方面的交流。中俄之間的和解使得中國在地緣政治上的壓力頓時解消大半，僅剩餘同周邊國家的零星爭議。隨著中俄的和解，也使得越南及印度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且「於八〇年代末、九〇年代初實現了中印和中越的關係正常化」。²³ 這種地緣政治環境的發展，使中國免於發生全面戰爭的恐懼，對中國而言，未來的戰爭將會是局部性的。

參、當前中國的地緣政治安全觀

一、中國的世界地緣政治安全觀

了解中國的安全觀一個最好的方法，即透過地緣政治的角度作分析。²⁴ 然而，研究中國的世界地緣政治安全觀不得不理解他們對「時代主題」的看法，當代中國對時代的主題由鄧小平所確立，強調「和平與發展」。²⁵ 這樣的用意在於爭取中國經濟的發展時間。確立「時代主題」之後，下一步則是對「國際戰略格局」的看法，所謂「國際戰略格局」指的是「一定時期內國際關係中起主導作用的力量之間的相對關係和結構形式」。²⁶

中國對於「國際戰略格局」有其時間性的劃分，可以劃分為冷戰期間及冷戰結束後至今的看法。關於冷戰時期的「國際戰略格局」看法，已形成共識定論，即二次大戰結束後，國際的戰略格局所呈現的是兩極對抗的冷戰格局。所謂的兩極格局是由三個層次所構成，第一層以美國與蘇聯為核心在全球的對抗與競爭；第二層則以蘇聯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為主的華沙公約陣營，同以美國及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為主的北約陣營在歐洲的軍事對抗；第三則以兩大集團所呈現的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在全世界範圍內的廣泛鬥爭。²⁷ 不過隨著東歐的鉅變，加上往後蘇聯的解體，冷戰時期的兩極對抗格局也步入尾聲。

冷戰的結束，國際政治進入所謂的後冷戰時期，這一個時期開啓中國內部對於新的「國際戰略格局」的討論。這一個討論內容主要表現在兩極格局的結束，國際體系所形成的新戰略格局是否為一個多極化的世界。如果是，這個多極化的世界，哪些力量才可稱上是「極」？

一般而言，中國內部對於多極化的「國際戰略格局」多為五極說，不過對於

「極」的代表者，則有不同的看法。多數對五極的代表看法為由美國、俄羅斯、日本、歐盟及中國等五國所構成的世界力量中心。²⁸ 這五大力量所憑藉的是其強大的經濟及軍事力量，不過這五個力量並非相等，美國在當中享有明顯的經濟及軍事優勢；俄羅斯則具有軍事優勢；歐盟及日本則享有經濟優勢；然而中國則是逐步在這兩個領域上有明顯成長，而這樣的五極說，有學者稱其為「一超多強」。²⁹ 一超指的是「美國在世界地緣政治格局的超強地位」。³⁰ 另外，除了主要的五極力量中心之外，印度、東協、以巴西為核心的南方共同市場（South American Common Market）、南非等國所組成的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等「潛在的極」的說法。³¹ 無論是幾極說，對於中國是否是世界的一極是肯定的，鄧小平拍板斷定地說：「中國不要貶低自己，怎麼樣也算一極」。³²

對中國而言，關於後冷戰時期，各國對於世界格局應該是多極化還是單極化，有著目標的差距。特別是蘇聯解體後，美國成為一個單一的超強地位。因而中國認為「美國作為冷戰的勝利者和唯一的超級大國，理所當然地希望建立由他主宰的單極世界」。³³ 在中國眼中，這表現在美國結合北約（NATO）所發動的科索沃（Kosovo）戰爭、堅持部署 NMD（National Missile Defense）、退出 ABM 條約（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強調「人權高於主權」等行動。³⁴

二、中國的亞太區域地緣政治安全觀

中國地處東亞，其陸地邊界兩萬兩千多公里，海岸線則長達一萬八千多公里，範圍擴及東北亞、東南亞及南海等。其陸地

鄰國十五個，分別為東鄰北韓，北鄰蒙古，東北鄰俄羅斯，西北鄰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西和西南同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不丹、錫金接壤，南與緬甸、老撾、越南相連。東部和東南同台灣、韓國、日本、菲律賓、汶萊、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隔海相望。

中國在東亞大陸複雜的**周邊**環境使其不得不注重其**周邊**地區的局勢穩定，中國的亞太區域地緣安全觀可分成四個層次。分別為由長江、黃河中下游及珠江流域所構成的核心地帶；由核心地帶外圍的邊疆少數民族區域所構成的邊緣地帶；中國疆域外圍由東北亞、東南亞、南亞及俄羅斯等**周邊**區域所構成的緩衝地帶；另外，中國國力、影響力所能延伸到的戰略地帶。在這四個安全層次當中，**周邊**緩衝地區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³⁵ **周邊**地區對於中國的安全十分重要，這是地緣政治上的現實問題，其構成中國與外部大國之間的緩衝地帶。因此，中國對於外部敵對勢力將其影響力伸入其**周邊**鄰國的舉動，必然極力反對。**周邊**的地緣局勢穩定，也深深影響著中國的發展。

中國在東北亞的安全所面臨的最大變數即是朝鮮半島的統一問題，即雙方如何進行統一，以及統一後朝鮮半島的走向，以及大國之間在這過程中是進行合作或是競爭。³⁶ 然而，去年所引爆的北韓核武危機，則為朝鮮半島的局勢帶來重大影響。首先，該危機使南北韓的和平進程受到嚴重挫折，其次，危機如果不儘速解決，將會破壞地區的穩定。³⁷ 朝鮮半島自古以來，即是中國最在乎的緩衝地區，這從甲午戰爭及韓戰皆是因朝鮮半島而起。此外

在中日關係上，中日之間的經濟與安全關係則呈現相互背離的發展趨勢。經濟上相互依賴漸深，但安全上則互斥加劇。³⁸ 中日安全關係的相斥性，表現在美日安保的再確定，防範的對象則從俄國轉為中國，中國不得不認為「該體制成為美國前沿威懾中國的戰略依託」。³⁹ 九一一後，日本通過的「反恐怖特別措施法」，為海外派兵立下法律基礎，使中國更視其為東亞地區的潛在威脅。⁴⁰

在東南亞的部分，東南亞幾個國家於1967年成立東南亞國協（ASEAN），成為一股影響著亞太區域局勢的地緣政治力量，對於東南亞該區域佔有很大的發言權。金融危機之後，削弱東協（ASEAN）在區域安全上的角色定位及其內部的凝聚力，使得美國自冷戰結束後重新回到東南亞區域，並逐漸增加其政經影響力。因而，中國方面認為「在防止東南亞地區為敵對勢力所左右的基礎上，謀求更廣泛的合作」。⁴¹ 不過，有關南海的爭議則為在六〇年代發現擁有豐富的石油資源後，為此產生不少糾紛。隨著紛爭的不斷，中國也為避免在此區域引發大規模衝突，進而影響其經濟的發展。曾於1984年提出「把主權擱置起來，共同開發，這樣就可以消除多年積累下來的問題。」但尚未成為政策。⁴² 直至1990年12月，中國總理訪問東南亞國家時，提出了「擱置主權、友好協商」的倡議。此舉使東協於1992年發表「南海宣言」（the ASEAN Declaration on the South China Sea），宣言中的基本原則和東協關於建立南海地區行為準則的倡議，在客觀上都有助於南海區域的和平穩定。⁴³

然而，整個東亞的安全環境不能將台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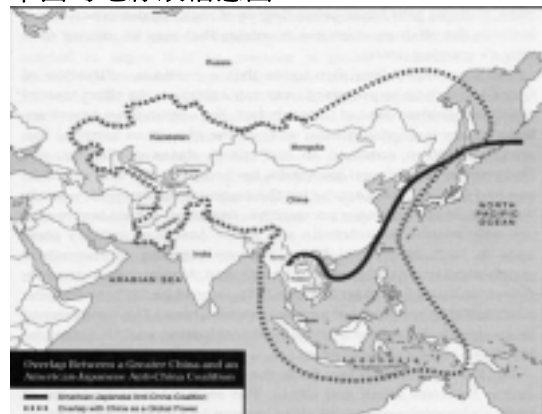
給忽略掉，台灣的地理位置位於西太平洋第一島鏈中央地帶，扼制台灣海峽、巴士海峽及鄰近太平洋海域，亦為東北亞最南端及東南亞、南海海域北端的銜接要域，並為中國大陸進出太平洋的門戶，對中國由陸權往海權的發展策略具有極重要的戰略意義，這對中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一旦中國對台實行軍事打擊，將不可避免引起美國的軍事干涉。⁴⁴ 中美的衝突，美國藉「美日安保」，勢必將連帶引起日本的介入，而俄羅斯為平衡美日勢力將有可能一同介入干涉。其他周邊區域國家，將不可避免置身度外。中國對台灣的統一主張，甚至是以武力促成的方式，為區域各國所嚴重關心，對於中國在維持周邊區域的穩定有重大影響。

中國在南亞地區有幾項特點，其一，西南亞與東南亞的形勢變化與中國和南亞發生直接影響；其次，印中關係為主要核心；再者，中國與巴基斯坦的關係也為不可忽略的重要部份；最後，冷戰後，中國與該區的關係面臨如何從戰略安全利益向經濟利益夥伴關係轉變的問題。⁴⁵ 不過，印巴在南亞地區所引發的核武競賽，為該地帶來局勢的不穩定，這對中國在南亞的安全，顯然是一個隱患。此外，九一一之後，美國為防恐事務積極與印巴雙方加強合作關係，印巴雙方也都積極拉攏美國，美國的介入有助於南亞地區的核子穩定。

此外，中亞局勢所面臨的問題有三，即為北約試圖東進中亞、裏海油氣資源的爭奪及阿富汗的戰爭問題，均對中國的政治安全、國土安全和能源安全構成不確定性與不利的影響。⁴⁶ 不過，由中國、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以及塔吉克所成立

的上海合作組織，強調「聯合打擊對地區安全、穩定和發展構成嚴重威脅的民族分裂主義、宗教極端主義和國際恐怖主義三種勢力」。象徵五國著手進行積極與防禦性的的安全合作事項。⁴⁷ 隨著中國力促上海合作組織的成立，以「中俄為核心的地區安全合作進一步加強。」這對中國於穩定中亞的局勢提供一個保障。⁴⁸ 同時，中國與俄羅斯藉此加強了彼此戰略夥伴的關係，更穩定了中國在北邊與東北亞的局勢。

中國的地緣政治意圖⁴⁹



三、中國內部地緣政治安全觀

中國的地緣政治內部安全觀強調的領土完整性，由於中國的幅員廣大，內部的民族組成眾多，尤其在邊疆地區主要的人口多為少數民族。⁵⁰ 這些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對於中國的統治一直處於對抗的分離主義態度，謀求能夠脫離中國政府的控制，進而獨立自主。儘管中國政府給予邊疆少數民族劃分自治區，允許其有部分自治權，但無法有效解決日益高漲的分離主義。

中國眼中分離主義的地區，以西藏的藏獨、新疆的疆獨、內蒙的蒙獨以及台灣的

台獨勢力為主。⁵¹ 中國政府認為這些分離主義的運動，將會造成中國統一的威脅，內陸的分離主義部分主要展現在西藏及新疆地區，西藏的部分在於達賴在國外以「人權問題與西藏問題攻擊中國政府，鼓吹西藏高度自治，企圖使西藏問題國際化，最終實現西藏獨立。」⁵²

此外，疆獨的問題在於民族與宗教的因素，也就是新疆地區主要的民族是維吾爾族人，信仰的宗教為伊斯蘭教，語言為土耳其語。因此，新疆內部的民族主義以泛伊斯蘭主義與泛土耳其主義為理論基礎，追求新疆的獨立並建立「東土耳其伊斯蘭共和國」。⁵³ 新疆的獨立運動的過程，伴隨著不少的暴力衝突，這些行為使得中國政府積極介入打壓。

對於中國而言，其所最在意的分離主義問題及台灣獨立運動的推行，中國認為台灣代表著「一個半世紀以來中國被瓜分、被割裂的縮影和象徵。」⁵⁴ 中國方面不時從歷史、族群血緣等因素強調對台灣的主權擁有，統一台灣是中國的使命，是「新中國建立以來實現國家統一的一項主要任務，是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為核心之黨的三代中央領導集團極為關注的一個重大問題。」⁵⁵ 因此，對於台灣的主權議題則強調以「一個中國原則」處理。北京的「一個中國原則」內涵有五點：第一，「一個中國」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其首都是在北京；第三，台灣只是其一個省或特別行政區；其四，台灣不能享有國際政治活動空間；第五，中國不放棄以武力解決統一問題。⁵⁶ 中國從這五點的說明，強調對台灣主權的控制，不同意台灣以國家的身份在國際間活動。

肆、中國地緣戰略中的台灣戰略價值

對於台灣，中國的看法是：「沒有台灣，中國就沒有進入太平洋最起碼的和有安全保障的可能；當然，沒有海權，中國有也就在相當程度上喪失了發展權。從這個意義上說，捍衛中國正當的海權就是捍衛中國的發展權。」⁵⁷ 是什麼樣的原因，讓中國不得失去台灣？以下就戰略價值觀檢視台灣因素分述如後：

一、主權價值

在國家領土主權統一的價值部份，強調自鴉片戰爭至新中國成立，所呈現的是「一部主權屈辱的歷史」，因此強調對主權問題的鬥爭。⁵⁸ 對於台灣，則宣稱「台灣，是我國的寶島，是我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⁵⁹ 中國對台灣的主權宣稱，有著濃烈的民族主義訴求，強調中國文化的大一統觀，也就是「天下分久必合」。認為要再發揚中國文化，更要完成中國的統一。其指出統一是民族感情的問題，進行分裂是違背中國的民族意識。⁶⁰

除了民族主義的訴求之外，中國更加從國際法的角度陳述對台灣主權主張的正當性。強調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的代表權已由中華民國轉移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據此，台灣的主權所有權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目前台灣的中華民國僅僅是擁有主權行使權。另一種理論看法則以「主權與治權的分離」理論來看待兩岸關係，其指出，台灣因為中國內戰的因素造成政治分離，因而導致主權與治權的分離。主權的部分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人民行使，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治權尚未及於台灣。

無論其訴求民族主義，或是高舉國際法大旗，所要表示的即是「中國只有一個，而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然而，中國面對處理台灣問題有其困難因素，其一為美國的介入，在政治、軍事、外交及經濟方面的支持，作為牽制中國的一步棋；再者，台灣內部台灣意識日漸高漲，不利中國的統一大業；最後，台灣問題日漸國際化，挑戰了中國宣稱「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任何外國不得干涉」的說法。

二、地緣戰略價值

此外，就地緣位置戰略價值的部分，由於台灣的地理位置特殊，位於西太平洋第一島鏈中央地帶，扼制台灣海峽、巴士海峽及鄰近太平洋海域，亦為東北亞最南端及東南亞、南海海域北端的銜接要域，對於中國的國家安全有著重大戰略價值。台灣與台灣海峽在於：第一，將成為中國東南沿海海上重要屏障與國防安全的前沿陣地；第二，對中國維護海航交通與海區安全有巨大價值；第三，為中國維護海洋權益與藍色國土起到重要作用。另有學者認為中國需要發展海權，而台灣正是中國進入太平洋的戰略要地，失去台灣將意味失去海權，失去海權意味著中國將失去「發展權」，而台灣問題就是與美國的海權之爭。⁶¹

中國現在的經濟發展有兩大要件。首先，需要大量的資源進口，特別像石油能源等。此外，生產出來的貨品則需要依賴出口，因此中國「必須走向世界，沒有這兩條，在市場經濟中已經解放出來的巨大生產力，對國家反倒是很危險的事」。⁶²此外，不同於發展海權的看法，則從軍事的角指出，美國的介入增添了解決台灣問題的複雜性。台灣問題是中國關心的重

點，中國在維護主權與國力發展的目標下，解決台灣問題必須「嚇阻美國的可能干預」。很明顯地，美國在美中台三角互動下成為關鍵的結構平衡者，論者也指出當美中關係越趨和緩，兩岸的緊張關係也會隨之和緩。⁶³但同美國的競爭並不意味要發展相抗衡的海軍力量，既使中國控制台灣，甚至拉攏將來統一的朝鮮半島，並不影響美國可以從日本、菲律賓、澳洲及紐西蘭的軍事基地圍堵中國。⁶⁴

對中國而言，台灣獨特的地緣位置，於周邊國家具有重大的地緣戰略意義，當中更是中國、美國及日本的利益交會點。這也成為中國堅持國家領土與主權統一，以及反對美日干涉中國內政的主要原因。

伍、結語

從上述的討論可以清楚地瞭解中國崛起所面臨的地緣安全環境，在全球層次上，中國面對戰後以美國為主一超多強的國際戰略格局，試圖將其往多極化方向推動。區域層次上，中國的先天地理條件所致，其在海陸兩方面皆面對著多重勢力的挑戰，特別是東亞部分。北邊的朝鮮半島、中間地帶的台灣及南邊的南海主權爭議等，都是中國所不可輕忽的要事。地方層次上，中國內部分離主義的高漲，乃是對於中國政府權力的莫大挑戰，而重要的是其不單只限於內部的爭議，更是涉及外部國際力量的介入，使得中國政府必須小心以對，不可任意強力打壓。換句話說，中國不論以什麼方式取得台灣，可能是創造歷史的開始，也可能是引發動亂的開始。這點出了台灣的安危將決定亞太地區未來的安全，更足見台灣的地緣戰略地位隨時可以牽動美、日、中國，甚至整個亞洲區

域的權力平衡。

中國對於台灣的價值設定有著層次上的區分，地方層次上，其建立在強調對台灣的主權擁有。在擁有台灣的主權基礎上，於區域層次中進一步對台灣做地緣戰略價值的設定。不過這樣的價值設定將產生利益的衝突，也就是說，當中國為維護其對國家主權完整性的追求時，其必須堅持統一台灣。必要時，甚至不惜以武力解決。但是，在上述筆者對於中國的亞太地緣安全環境的討論中，台海的衝突與否關係著整個亞太地區的穩定。特別是以美國及日本為主的海上勢力，必無法容忍該區域爆發衝突。因此，一旦台灣、中國發生武裝衝突，勢必引起各方的強力介入。這樣一來，中國所面對的衝擊將是難以評估。何況中國現在強調其必須掌握經濟發展的機遇期，並對外訴求中國的崛起所帶來的是和平，而非衝突。

因此，在中國對台灣的戰略價值的設定上，必須正視其所產生的矛盾性，這樣兩種價值的追求是互斥，而非相容。一旦中國選擇違反民主潮流的「武力解決」兩岸關係，如此中國勢將面對全球民主國家的反制，屆時，不僅中國的經濟倒退三十年，全球的經濟也將面臨重創。

【註釋】

- 1.有關中國「和平崛起」的說法，可參見溫家寶2003年於美國哈佛大學的演講稿—「把目光投向中國」，網站為：<http://www.fmprc.gov.cn/chn/wjdt/zyjh/t56075.htm>，2003年12月10日。
- 2.樓耀亮，地緣政治與中國國防戰略（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71-74。
- 3.轉引自劉金質，冷戰史-上（北京：世

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頁220。

- 4.毛澤東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1472-1473。
- 5.毛澤東選集第4卷，頁1475。
- 6.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頁132。
- 7.樓耀亮，前揭書，頁110。
- 8.布理辛斯基，運籌帷幄（南京：譯林出版社，1989年），頁11。
- 9.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頁4。
- 10.中國外交部，1969，「珍寶島從來就是中國的領土」，轉引自李運慶，冷暖歲月-一波三折的中蘇關係（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9年），頁350-351。
- 11.劉金質，冷戰史-上，頁111。
- 12.韓念龍主編，「當代中國外交」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p222。轉引自王泰平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第3卷（1970-1978）（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頁356。
- 13.裴堅章主編，毛澤東外交思想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頁179。
- 14.劉金質，冷戰史-上，頁110。
- 15.上海公報全文請參閱網站：http://www.mac.gov.tw/big5/rpir/1_11.htm。
- 16.劉金質，冷戰史-中（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頁830。
- 17.李長久等，中美關係200年（北京：新華出版社，1984年），頁248。
- 18.轉引自羅致政，「美國在台海兩岸互動所扮演的角色——結構平衡者」，美歐月刊，第10卷第1期，（1995年1月），頁37-54。

- 19.謝益顯等，中國當代外交史1949-1995（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頁288。
- 20.劉金質，冷戰史-中，頁839。
- 21.樓耀亮，前揭書，頁112。
- 22.轉引自劉金質，冷戰史-下（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頁1198。
- 23.樓耀亮，前揭書，頁113。
24. William T. Tow. *ASIA-Pacific Strategic Relations: Seeking Convergent Security* (Singapore: Green Giant 2001), p.15.
- 25.梁守德、劉文祥，鄧小平的國際政治理論（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21。
- 26.張萬年，當代世界軍事與中國國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9年），頁29。
- 27.郝潤昌、高恒，世界政治新格局與國際安全（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6年），頁4。
- 28.參閱張萬年，前揭書，頁29；戴德錚等著，當代世界格局與國際關係（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51。
- 29.郝潤昌、高恒，前揭書，頁51。
- 30.樓耀亮，前揭書，頁140。
- 31.張宏毅，現代國際關係發展史：1917～2000（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361。
- 32.參閱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353。
- 33.沈偉烈、陸俊元，中國國家安全地理（北京：時事出版社，2001年），頁97。
- 34.黃偉鋒，「論新世紀初國際環境的新變化及其對中國對外戰略的影響」，中國外交（2003年1月），頁15。
- 35.朱聽昌，中國周邊安全環境與安全戰略（北京：時事出版社，2002年），頁27-31。
- 36.唐世平，「2010-2015年的中國周邊安全環境」，中國外交（2003年1月），頁7。
- 37.俞新天主編，2003國際形勢（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68。
- 38.金熙德，中日關係（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年），頁32。
- 39.楊運忠，「對21世紀初中國安全面臨的主要威脅的戰略思考」，中國外交（2003年2月），頁11。
- 40.刀書林，「中國周邊安全環境爭議」，中國外交（2002年5月），頁3。
- 41.唐世平，「理想安全環境與新世紀中國大戰略」，戰略與管理第6期（2000年），頁44。
- 42.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87。
- 43.岳德明，「中國南海政策爭議」，戰略與管理第3期（2002年），頁55。
- 44.時殷弘，「關於台灣的幾項必須正視的大戰略問題」，戰略與管理第2期（2000年），29。
- 45.趙伯東，當代南亞國際關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頁312。
- 46.卿文輝、孫輝「後冷戰時代的中國國家安全」，戰略與管理第1期（2001年），頁3。
- 47.何作，「中國面臨的亞太安全環境」（2000年）。收錄於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全球戰略大格局：新世紀中國的國際環境（北京：時事出版社，2000年），頁387-388。
- 48.羅援主編，世紀回眸與前瞻：2002版

- 戰略評估（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2年），頁44。
- 49.取圖自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p184.
- 50.中國的民族分類有五十六個，其構成與分布有幾項特點：第一，漢族為當中最大一族，其佔中國十二億人口數中約十一億之多，其他民族則約九千七百多萬；其次，由於自然、經濟、社會及歷史之因，少數民族一半人口以上居住在邊疆地區何部分沿海地區；第三，少數民族分佈的地域約佔中國總面積的63.2%；第四，分部地區多為西北、西南及東北等偏遠地區，自然條件較差；第五，佔多數人口的漢族與這些少數民族的文化差異性大，特別是宗教方面；最後，這些少數民族與國外的民族有著密切關係。參見洪兵，國家利益論（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9年），頁381-390。
- 51.樓耀亮，前揭書，頁186。
- 52.張萬年，前揭書，頁186。
- 53.鄭必堅、楊春貴主編，中國面向21世紀的若干戰略問題（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0年），頁177。
- 54.黃仁偉，中國崛起的時間和空間（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頁122。
- 55.劉宋斌，國家統以一方略（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221。
- 56.吳安家，台海兩岸關係的回顧與前瞻（台北：永業出版社，1996年），頁56。
- 57.張文木，「全球化視野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問題」，中國外交，第6期（2002年），頁6。
- 58.閻學通，中國國家利益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192。
- 59.洪兵，國家利益論（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9年），頁373。
- 60.王功安，「從『三個代表』的高度認識完成祖國統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台灣研究 專論，第4期（2002年），頁16。
- 61.張文木，「科索沃戰爭與中國新世紀安全戰略」，戰略與管理，第3期（1999年），頁3-7。
- 62.張文木，「全球化視野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問題」，頁13。
- 63.羅致政，「美國在台海兩岸互動所扮演的角色——結構平衡者」，美歐月刊，第10卷第1期（1995年）；「台灣安全多邊化戰略」，問題與研究，第35卷第9期（1996年）。
- 64.唐世平，「再論中國的大戰略」，戰略與管理，第4期（2001年），頁33。◎